

## 悲憶錢經宇(智修)先生

俞頌華

經宇先生與我是於前清光宣時代，在吳淞復旦公學同學之時，開始發生友誼的。屈指計算，迄今已四十多年了。這四十多年中，雖世事滄桑，飽經憂患，可是我們的交情與時俱深，久而始終相敬。他年紀雖長於我，而其身體卻素來比我強健。如今未聞他的病訊，而突接他的噩耗，實在使我不僅悲哀，而且神經上卻還好像受到了一個重擊！

在這樣的一種情緒之下，我一閉眼睛，好像他的音容笑貌就浮在我的眼前，不禁使我對他回想，再回想。

我先回憶到我們同學的時期。當我考進復旦公學的時候，校中分六個年級，我插在第五班，要五年才能畢業。經宇先生與陳寅恪先生等均比我高一班，在第四班。記得故友梅光迪先生那時還比我低一班。當時復旦的班次是依英文程度的高低來分的。經宇先生初在「震旦」肄業，習法文。震旦鬧了一次風潮，一部分員生創立復旦，他是那時從震旦到復旦的，所以班次插得不高。當時他的

班次雖不高，可是他國學國文的湛深，以及他文章的洛陽紙貴，上海進步的報館都爭聘他為特約撰述，那是全校都知道的。因此，稍微年輕一點的同學，都尊稱他為錢先生，時常要向他請教。同學們請教他的時候，他總是一面非常謙和地說，大家來研究和談談是好的，一面卻總是針對各人的需要，指示自習的方法和必讀必看的書。當時我也是時時向他請教的一個，自己覺得得益比從教師講授所收獲的還要豐富。這一點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。

那幾年中復旦教務長始終是李登輝老師，但校長卻時有更迭，都是當時的名人。我初進復旦時，嚴復（又陵）為校長，其後高夢旦、夏劍丞、馬湘伯等諸先生均先後來為復旦的校長。經宇先生是在前清末年畢業於復旦的。畢業後即為前校長夢旦先生延聘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去，那時該所還在草創時代，編譯先生的宿舍頗狹窄，我曾到該館去並到宿舍去訪候他，他談於榮利，對我表示，他對於編譯工作甚感興趣，對於住所的侷促則毫不介懷。

錢先生貌似老學究，故許多友人僅知他國學國文堪稱專家，而孰知他的英文，造詣卻亦深湛。他習英文，雖如和尚半路上出家，並非從幼時起即修習，可是他不僅聰穎，且甚勤學，他的英文，經李登輝先生及其他名教員訓練之後，在校數年中，其進步即一日千里。記得他進了「商務」以後，曾編譯過數本歐美名人傳，列入少年叢書，內容極充實。最使我難忘的，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了以後，他即譯過一本美總統威爾遜在戰時的著名的演說集。威氏所抱的崇高的理想，和對世界和平的熱忱，均躍然紙上。那本譯本是中英文對照的。前面是各篇譯文，後面附有原文。一般學子以及國內愛好和平的人士都爭相購閱，銷數之多，出乎該館當局預料之外。復旦前校長嚴復氏，嘗謂翻譯應於「信」「雅」「達」三端並重，看了這本譯文，可以知道對這三端都發揮無遺，足使人無間言。

「商務」所出歷史最長的雜誌是東方雜誌。主編人先前更迭了很多。後來錢先生繼「俞父」（杜亞泉先生）主編，一編編了將近二十年。在他主編該誌時，該誌內容日新月異，銷數日擴，後來增加圖片及畫報，更由月刊改為半月刊，使該雜誌社業務一天天發達。他是東方雜誌功臣之一，那是大家所公認的。他主編「東方」時，取材異常豐富而謹嚴。他自己審查關於國故與文學的來稿，因為無第二個人堪像他那樣勝任，同時對於社友的譯文，他也

時常與原文對照，一定要它能「信」。記得當時有一位友人，進入「東方」擔任編譯後，因為他的譯稿，只能做到「雅」「達」，而常常欠「信」，要勞他化許多時間校正，後就請那人調到別的沒有翻譯工作的部分去工作。他對於校對亦異常注意，在每期出版前，先有一本清樣出來。清樣出來後他總是帶到家裏去費許多時間親自過目，然後簽字付印。他作事非常負責是一絲不苟的。「東方雜誌對外的信用，就是他以這樣的辦事精神，鍥而不舍地造成的。」其次，我回想到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一年「一二八」上海事變之間我應他之邀，到商務去參加編譯工作的時期。在這一段時期，我覺得在過去是精神上最愉快，工作效能也比較豐富。因為那時他很體諒我，特許我兼任大學的教科，我一方面利用東方圖書館的藏書和西報雜誌，可以隨時增加我的新知，以充實我在「東方」所寫的文字內容，同時又可充實我所兼任的教材，以俾益幸。他與我共事時，我們早夕相見，在辦事方面異常連手，我抱了學習的態度去工作，隨時向他請教，討論工作上的問題，得在雜誌社裏學到許多實際的經驗，那都是在留學時期所得不到的。這也是使我永久記憶的一端。

復次，還有關於錢先生的二件事，大家都沒有知道，我想在這裏約略附帶的報告一下：

（一）我參加東方社工作時，錢先生一面主編東方，一面兼任

館內辦的國文函授主任。國文函授社的業務那時在他主持下亦一天天發達。我有一位朋友是內地某高中的國文教師，因聞錢先生之名，來了一封信，請我介紹到該社工作。我當時很粗心地將來信陳交錢先生一閱，未加斷語，但問他有無答應的可能。他帶來信，細細看了二遍，馬上交還我，說「不能考慮。」同時指出一個原因，即那信上「潭安」之潭字寫作禪。他說「這是來信者的疏忽。這兩字意義不同，差別甚大。假使請他來改文卷，我實在是不放心的。」當時我內心有點慚愧，同時卻實在佩服他的精細。

(二)我在參加東方工作之前，曾與張東蓀先生同在中國公學服務並擔任些教科。有一個時期，我曾主持過教務事宜。要物色一位法律系主任教授。我請錢先生介紹，他經過考慮之後，鄭重提出謝冠生先生，介紹我去和他先談談。那時東蓀求賢若渴，立刻同我去訪問謝先生。謝先生與我們彼此都陌生，從未見過面，不過我們邀聘之意甚誠，並且有錢先生介紹，他信任錢先生，就也與我披誠相見，最後他竟欣然允諾。謝先生國學極深，我們還會請他出其餘緒，兼講過一學期「國學門徑」，全校學生選讀此學程者真是十分踴躍。我們法律系的人才，經謝先生造就的很多，例如阮毅成（現浙江民政廳廳長），和張慶楨（中大法律系主任兼監察院委員）等諸君，在出國留學前，都是謝先生在「中公」大學部時

的高足。全校同學當時但知謝先生是國內不可多得的名教授，卻沒有一個人知道，謝先生的執教「中公」是錢先生介紹的。如今知道了，「飲水思源」，他們怎能不感謝錢先生呢？

以上是我回憶中的一鱗一爪。自從上海「一二八」事變，商務編譯所和東方圖書館都被敵機放火燒燬，錢先生與我就都不得不從此離開了「商務」這愉快的工作崗位。他那時應了于右任先生之聘，到監察院去做事，我則仍轉輾送幹教書和報館編輯工作。全面抗戰以後，我們都到了大後方，在重慶時，彼此仍時相過從。日人投降以後，我們都回到京滬。他由重慶飛京之前曾與冠生先生到我家裏暢敘半天，他與謝先生起飛到南京前幾天，我也曾分別到錢、謝兩先生處去送行。執意錢先生與我在重慶最後一次晤談後，竟成永別！我心中實在悲傷，實在難過，非筆墨可以形容！

胡愈之先生在東方與錢先生同事最久，我希望他也有紀念文寄來國內發表。謝冠生先生與錢先生是同鄉且有親戚之誼，我希望他為錢先生寫一篇傳，把錢先生幼年及晚年的情況也告訴我們。錢先生是一個文化工作的健將，在晚年從政的時候也清廉自守，絕不假借政治地位，做一點苟且自私的事，其亮節高風，在現時的政界中可算是一個楷模。這樣一個好人，大家應當為文紀念他，使他永遠活在人們，尤其是青年們的心頭。